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谱系建构研究

勒伍阿支

摘要：随着人口流动与信息交换的加快，思想与文化的高频互动促使各种文明形态不断更新与变迁，人类如何应对不同文明形态日益趋同化的问题成为研究热点。西南少数民族灾害知识是西南少数民族与自然博弈过程的实践累积，具有浓厚的地方性与民族性，与科技防灾互嵌在日常防灾减灾体系中。基于既有灾害研究理论与方法，应以“文化主位—外来启迪—本土发声”为整体逻辑，以“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多元耦合—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的多维嵌入—本土与他者的多向交流”为原则，以“外来启迪—整理国故—本土发声”为路径建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谱系。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谱系建构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4）03—0116—14

灾害对西南地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与变迁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剧烈冲击着当地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影响着当地村寨结构和生计方式。西南各少数民族基于其传统文化及信仰土壤形成了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多样性、实用性的灾害知识。这些灾害知识以神话传说、祭祀仪式、文学艺术、习俗庆典等为载体，形成各民族群众的防灾避灾减灾思想，既能体现村寨凝聚力和互助精神，又有利于群众的心理安慰和情感宣泄。自邓拓的中国救荒史研究伊始，许多学者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视野，对灾害与灾荒进行了诸多探讨，成果颇丰，为该领域的推进做出了贡献。^①本土灾害知识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取得了可观的成果^②，但尚未对本土灾害知识谱系建构进行系统的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项目号：17ZDA158）、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中华民族灾害文化的传承与共同体意识建构研究”（项目号：2022MDZL02）、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自主科创项目“生态文明视域下藏羌彝植物文化对比研究”（项目号：BZKY20241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勒伍阿支，女，彝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边疆安全、灾害文化研究。

- ① 周利敏：《社会脆弱性：灾害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从社会脆弱性角度出发，研究社会结构与灾害的关系。杰·特伦斯·麦凯布：《图尔卡纳游牧牧民对干旱的冲击与回应：人类学理论和灾害研究的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与安东尼·奥立佛·史密斯：《当代灾害和灾害人类学研究》，《思想战线》2015年第4期；从人类学角度出发，研究灾害与人类行为与文化变迁的关系。周琼：《灾害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史学集刊》2021年第2期；《云南历史灾害及其记录特点》，《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从历史学角度出发，研究历史防灾经验对当代防灾的启示。
- ② 参见周琼：《换个角度看文化：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防灾减灾文化刍论》，《云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李永祥：《灾害文化与文化防灾的互动逻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张方修琦：《灾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史学集刊》2021年第2期；余新忠：《中国传统瘟疫叙事中的灾疫文化初探》，《史学集刊》2021年第2期。

本文在灾害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以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为基点,探索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谱系的建构原则、路径以及其在防灾减灾中的实践,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现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现代化添砖加瓦。

一、理论与方法: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谱系的探索

对于灾害这一社会性现象,人们所采取的态度是文化性的。文化具有强大的辨识性,是理解灾害、认识灾害以及应对灾害的关键因素。灾害文化被认为是“在灾害发生的条件下,以灾害观念为核心和灵魂,以救灾物资为依托,灾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和”^①,是人们对待灾害的态度、思想、理念、行为、经验、习俗等的总称^②。人们对灾害的认知凸显了有关自然与文化、有序与无序、时间与空间以及传统的男女性别区分与生死等二元结构,显示了自然与非自然力量的对比。^③灾害还牵涉社会与宇宙正义的观念,涉及罪孽与报应、因果,世俗与神圣的关系以及神的存在和本质问题。^④

(一)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谱系建构理论取向

本土灾害知识研究范式以灾害与文化互动关系为主轴,涉及多个学科理论。社会学理论认为灾害是社会现象,需要通过对社会结构、组织和行动的研究来理解灾害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强调社会因素在灾害中的重要性,并围绕社会因素派生出社会脆弱性理论、韧性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等。社会脆弱性理论认为社会群体在面对灾害时具有不同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受到社会经济条件、文化背景、政治力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⑤风险社会理论认为风险的选择取决于所选择的社会形式、共同的价值观导致的共同的恐惧^⑥,即人们的价值观和信仰会影响其所采取的立场和实践方式。韧性理论指个体和社区在面对灾害时的适应能力和恢复力。^⑦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灾害是通过社会互动和意义构建而产生的,强调社会和文化因素对灾害认知、解释和应对的影响,提醒人们在理解和应对灾害时要考虑不同社会群体的观点和经验。

人类学理论认为灾害是一种文化现象,强调文化因素在灾害中的重要性,重视灾害文化中人们的信仰、价值观、习俗和行为,并围绕文化因素产生了文化和行为应对理论、社会文化变迁理论、适应性理论等。文化和行为应对理论认为人类行为和文化能够对灾害作出有效应对,包括社会结构、组织、传统知识等。^⑧社会文化变迁理论认为自然灾害与文化变迁之间具有互动关系,文化能应对灾害,灾害也能导致文化变迁。^⑨适应性理论把适应作为一个用来解释人类行为系统内部与外部环境关系的理论框架。^⑩

① 王子平:《灾害社会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2页。

② 周琼:《灾害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③ [美]苏珊娜·M.霍夫曼:《魔兽与母亲——灾难的象征论》,赵玉中译,《民族学刊》2013年第4期。

④ [美]安东尼·奥立佛-史密斯:《人类学对危险与灾难的研究》,彭文斌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⑤ [美]安东尼·奥立佛-史密斯:《灾难的理论研究:自然、权力和文化》,纳日碧力戈译,彭文斌校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1期;周利敏:《从经典灾害社会学、社会脆弱性到社会建构主义——西方灾害社会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及比较启示》,《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⑥ DOUGLAS, M. & WILDAVSKY, A. (1982). *Risk and Culture: An Essay on the Selection of Techn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ngers* (1st 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van Riet, G. (2021). The Nature-Culture Distinction in Disaster Studies: The Recent Petition for Reform as an Opportunity for New Thin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Science*, 1-10.

⑦ 张曦:《社会变迁中强韧性的增幅化》,《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⑧ 曾维和、周小俊:《气象灾害的人类学研究途径——兼论应对气候变化视角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内涵》,《闽江学刊》2014年第1期。

⑨ [美]迈克·莫斯利、申晓虎:《安第斯的久旱、并发性自然灾害及人类的反馈模式》,《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Thornburg, P., Knottnerus, J.D., & Webb, G.R. (2007). Disaster and deritualiz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findings from early disaster research.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4, 161 - 166.

⑩ Vayda, A., & McCay, B.J. (1975). New Directions in Ecology and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 293-306. Holling, C. S. (1973).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4, 1-23.

人类学视角将学术关怀引向灾害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和自然的互动方面,不仅关注灾害本身的物理过程,还关注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社会文化因素、历史背景和应对策略,为灾害研究提供全面的视角。

历史学理论认为需要通过对历史上的灾害事件和灾后重建的研究来理解灾害文化的演变,强调历史因素在灾害中的重要性,并围绕历史因素,派生出事件史观、灾害记忆等理论。事件史观认为灾害是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的社会、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研究灾害事件的历史背景、演变过程和影响,可以揭示灾害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历史灾害事件的统计和分析,可以揭示灾害的周期性、地域性和季节性等特点,为预测和防范灾害提供依据。^①灾害记忆理论认为灾害事件的记忆并非完全客观存在,而是通过社会互动和意义构建而形成的。^②这一理论为理解灾害事件的长期影响和社会记忆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由上述可知,不同的学科基于其对灾害的认知演绎出了不同的理论取向,大多数理论都是基于国外社会背景而产生。然而国内外的社会现实终究存在着差异,学界必须结合中国国情、防灾减灾政策、各民族的传统灾害知识,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土灾害知识谱系研究体系。

(二) 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谱系建构方法探索

本土灾害知识谱系的研究方法滋生于其他学科之中,或直接借鉴,或创新引用。民族志是基于实地调查、建立在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从而成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最有说服力的方法之一。民族志最早由马林诺夫斯基在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③一书中提出,此后被广泛用于各学科研究中。民族志提供了关于研究和理解文化和社会群体的框架和原则,能够深入了解和描述西南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习俗和行为,从物质和社会两个层面理解灾害现象。^④民族志书写中,学者在整理和撰写研究结果时,从参与观察和参与访谈的角色切换到观察者和分析者的角色,将个人经历与普遍现象相结合,将个体的经验和观点与族群的文化联系起来,形成对族群文化的描述和解释,有助于深入、全面了解各民族村寨或群体在灾害事件中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⑤

跨区域和跨文化比较研究是一种将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下的灾害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有助于深入理解不同地区和文化对灾害的认知、应对和管理方式,从而提供更全面和综合的视角。例如,比较不同地区的自然灾害频率、强度和影响范围,分析其背后的地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以及不同地区的灾害管理和应对策略的异同。从而促进不同地区和文化之间的经验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灾害管理和应对的效果。^⑥

历史文献分析法则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系统收集、整理和分析,获取关于灾害事件的详细信息和理解^⑦

-
- ① [墨西哥]弗吉尼亚·加西亚-奥克斯塔:《灾难的史学研究》,[美]苏珊娜·M.霍夫曼、[美]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主编,彭文斌译:《灾难与文化》,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40—57页。
- ② Heading, B. (1978). Kai T. Erikson, Everything in its Path: Destruction of Community in the Buffalo Creek Floo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6). 284.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12(1), 141-144.
- ③ [英]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褚建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98—102页。
- ④ [美]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苏珊娜·M.霍夫曼:《人类学者为何要研究灾难》,彭文斌编译,《民族学刊》2011年第4期;[美]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当代灾害和灾害人类学研究》,陈梅译,彭文斌校,《思想战线》2015年第4期;李善靖、张玮:《在野之谈:太行山田野作业的经验与方法——基于山西大学民间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系列调查的探讨》,《地方文化研究》2020年第6期。
- ⑤ 杨庭硕:《麻山地区频发性地质灾害的文化反思》,《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美]托马斯·哈定:《文化与进化》,韩建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54页。
- ⑥ Button, G. (2010). *Disaster Culture: Knowledge and Uncertainty in the Wake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 (1st ed.). Routledge. Hewitt, K. (Ed.). (1983). *Interpretations of Calamity: From the Viewpoint of Human Ecology* (1st ed.). Routledge.
- ⑦ 刘梦颖:《灾害民俗学的新路径:灾害文化的遗产化研究》,《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以及人类的反馈模式的变迁等。^①其优势在于可以获取到较长时间范围内的数据和信息,帮助研究者了解灾害事件的演变趋势。

(三) 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谱系建构的价值

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研究目前仍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本土灾害知识谱系理论研究不足。目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本土灾害知识现象的描述和分析,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和体系构建。二是灾害史料整理和研究不够系统与充足,导致许多研究者在分析本土灾害知识现象时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三是本土灾害知识谱系建构的跨学科合作不足。本土灾害知识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然而,从社会科学角度研究灾害的成果远远少于从自然科学角度研究的结果,制约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四是本土灾害知识与防灾减灾政策制定脱节。本土灾害知识应服务于防灾减灾工作,与防灾减灾政策互为补充。然而目前本土灾害知识谱系建构与防灾减灾政策制定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导致本土灾害知识谱系建构成果难以转化为实际的政策措施。

西南少数民族的灾害成因观带有深刻的文化烙印,其中含有当地人对于生境的适应和灾害应对的地方性知识,这些地方性知识构成了西南民族地区的本土灾害知识谱系。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谱系本身及其理论的建构,要从中国本土出发,结合中国实际和历史文化传统,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方法路径和实践应用,在学术和实践层面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于学术价值层面而言,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谱系建构一方面能够推动灾害研究的理论创新,丰富灾害知识的理论体系,促进灾害学科体系建设和跨学科交流。从文化角度研究灾害,跳出了传统的自然科学领域的局限性,使得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谱系建构不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而是形成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的挖掘、整理、研究,有助于理解西南少数民族对社会、自然以及人类本身的认知,增强人们的防灾减灾意识。

于实践价值层面而言,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谱系建构能够促进灾害防范和减灾工作的科学化,优化灾害应急管理,提高灾害教育和宣传的有效性。灾害认知与灾害应对是防灾减灾文化维度的直观表现形式,将地方性知识与当代民族村寨防灾减灾实践结合起来,从人们的观念和实践层面输入防灾减灾的意识和理念,有助于完善民族地区的本土化灾害管理体制,为灾害防范和减灾工作提供科学依据,使得灾害防范和减灾工作更加高效,从而构建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村寨。因此,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谱系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文化主位: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谱系建构原则

“主位”(emic)与“客位”(etic)一词最初是由语言学家肯尼思·派克(Kenneth Pike)于1954年从语言学的术语音位学(phonemic)和语音学(phonetic)类推出来的。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分别表示从被研究者和研究者的角度出发,主位研究是指研究者不凭自己的主观认识,尽可能地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文化,通过听取当地人对事物的认识来进行整理和分析,“而不是按照一种外在的衡量标准对其进行概念上的抽象和概括”。^②显然,从研究视角而言,文化主位既是研究者挖掘地方性知识服务于研究,也是灾害现场扎根社会生活吸取养分的策略。^③从知识的建构方式而言,文化承接了源自灾民的思想感情和话语。^④在理论建构的思考过程中要彰显“文化主体性”和自主实践性,同时将文化和历史纳入理论建

① [美]迈克·莫斯科利、申晓虎:《安第斯的久旱、并发性自然灾害及人类的反馈模式》,《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Yu, F., Chen, Z., Ren, X., & Yang, G. (2009). Analysis of historical floods on the Yangtze River, China: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anations. *Geomorphology*, 113, 210-216.

②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和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

③ 刘红旭、胡荣:《文化主位的建构主义:灾害社会调查的范式、伦理和方法》,《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④ 刘红旭、胡荣:《文化主位的建构主义:灾害社会调查的范式、伦理和方法》。

构和知识再生产的思考框架中。^①理解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知识谱系的合理性,需要全面把握西南地区地理空间的特殊性、文化空间的多样性,理解当地人的意义生成系统、价值关联、整体思考框架以及本土观点的表达和建构。

(一) 多元耦合:“非均质性”的地理空间与多元性的文化空间相结合

“非均质性”是地理学概念,指“特定区域内部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多元性以及各环境要素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②西南地区的地理环境具有明显的“非均质性”。西南地区地形复杂崎岖,以山地、丘陵为主,又处于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交界地带,新构造运动强烈,多发生地震灾害,岩体破碎,易发生泥石流灾害。西南地区还处于中国气候南北分界线附近,致使这一地区长期处于冷空气与暖湿气流交汇地带,气候暖湿,流水侵蚀、溶蚀作用显著,岩溶地貌发育典型。部分地区土层瘠薄、耕地缺乏,加之地层保水性差,地面常因缺水而受干旱之灾。地形与气候多样化使西南地区常呈现出“十里不同天”之景观。如云贵高原有众多因构造作用形成的小盆地、外力流水作用形成的深切峡谷和深邃的圆形洼地;滇南帚状山脉区分布着宽广的山间谷地和盆地。

西南地区因地理要素的空间差异而生成各自不同的“区域特性”^③,在这些区域内滋生并成长的族群及其文化,受制于所在的自然环境,形成了彼此之间明显不同的生计方式与社会结构,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传承或转型等方式对其不断形塑与重构,呈现出空间上的多元分割,时间上的间断和“非传统化”,从而形成了具有多元性特征的文化空间。^④

“非均质性”的地理环境和多元的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相互耦合建构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民族生境。这个被建构出来的次生生态环境包含了西南少数民族在与自然博弈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是文化在适应“生境”过程中的功能表达。^⑤因此,在挖掘本土知识、建构本土知识合理性的过程中,避开催生本土知识的文化土壤与地理环境是不可取的。尊重西南地区地理空间的“非均质性”和文化空间的多元性,是挖掘灾害相关的本土知识、总结与反思本土经验的有效性、建构本土知识合理性的必要原则。

(二) 多维嵌入: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相结合

灾害是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的社会、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历史经验早已显示,灾害可能成为引起重大社会和文化变革的诱因。在某些时期,灾害同样可能扮演着不为人知的启示者和曝光者的角色。对于灾害的研究与记录,实际上构成了编织历史记忆的线条。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是对灾害发生原因和过程的解释,是对灾害应对和减灾方式的经验总结,是一种象征符号和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由社会互动和意义构建形成,村寨和个人通过回忆、叙述和象征等方式来构建和传承灾害记忆,促进了村寨成员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同时,灾害记忆也可以提醒人们对潜在灾害的警惕,促进灾害预防和应对能力的提升。

在亟需建设西南边疆生态安全及生态屏障的形势下,除了关注政策的顶层设计,本土灾害知识的挖掘也值得被重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危机的变迁发生了极大的转型。西南边疆生态环境的变迁发生了从自然演替为主向人类影响为主的转变。灾害诱因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灾害类型不断出现,生态屏障屡屡遭受重创,人类与灾害之间的斗争日益升级。^⑥西南地区地形复杂

① 潘泽泉:《社会工作本土化:社会工作本土知识建构如何可能》,《社会工作与管理》2014年第3期。

② 尹建东:《环境、族群与疆域空间: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史观和阐释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9期。

③ 尹建东:《环境、族群与疆域空间: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史观和阐释路径》。

④ 徐新建:《西南研究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08,136,138页。

⑤ 刘梦瑶:《“民族生境”视域下的绿色治理探析》,《贵州民族研究》2022年第5期。

⑥ 周琼:《诱因与转型:西南边疆灾害孕育的环境变迁历程再审视——兼论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自然生命平等观》,《求索》2023年第3期。

多样,气候多变,降水分配不均,旱涝灾害频繁,部分地区还存在水土流失、沙漠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问题。加之在现代化洪流的冲击下,资源开发等因素导致人为灾害增多,生态危机频发。西南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人与自然的博弈越发激烈,进而对防灾减灾的要求不断提高,多样化、有效性的防灾举措成为现实防灾需求,历史经验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历史灾害案例可以作为现实防灾的镜鉴。将历史上的官方文献、个人信件、传说故事作为民族志资料来源,从历史灾害中了解、把握灾害发生的规律、灾害的成因以及应对措施的有效性和不足之处等,能给当代灾害的预防与应对提供宝贵的借鉴,引导人们制定更加科学有效的防灾减灾措施。^①如根据湖南省1950—1998年各等级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及其累积值,推测出20世纪90年代大水灾出现的可能性极大,而事实是1991、1994、1995、1998、1999年确实发生了大或特大水灾。^②

其次,将历史灾害记录用于当前的灾害预警和应急响应。通过将历史灾害记录转化为灾害数据库,可以建立更为全面、可靠的灾害信息系统,为当前和未来的灾害进行预测和评估。同时,历史灾害记录也可以用于制定针对性的应急响应方案,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1997年6月5日,四川省美姑县乐约乡遭受特大暴雨、冰雹袭击,导致乐约乡则租地带大面积山体滑坡并诱发泥石流,死伤无数,损失惨重。幸存者告诉笔者,该地大概每六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坍塌,曾在1877年和1937年左右发生过坍塌,由于汲取历史经验不足,忽视了某些灾害的周期规律,因此缺乏灾害预防措施。

最后,将历史灾害研究成果与村寨灾后重建相结合。历史灾害研究结果可以用于指导灾后重建,包括制定灾害预防和应对措施、改善村寨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增强群体和个体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实现历史灾害研究和现实防灾需求的有机结合。

(三) 多向交流: 贴近感知经验与遥距感知经验的交融

“贴近感知经验”和“遥距感知经验”是格尔茨提出的概念,前者指信息提供者的直接感知。后者指专家根据信息提供者对事物规范的界定去从事其科学的、哲学的或出于实践性目的的研究。^③在研究过程中,囿于“价值关联”^④的影响,研究者不可避免地将价值附着于对象之上,使对象成为有价值的事物^⑤,运用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对被研究的社会历史现实进行考察,以此揭示其本质特征和存在的真正意义。在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谱系建构过程中,研究者同样往往忽视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表达和意义建构,回避“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站在“他者”的角度建构文化持有者的观点,一方面易造成“他者”话语过重而本土“失语”的局面;另一方面易产生研究者认识上的主观极端化倾向,造成偏离或过度解读文化持有者的本质意图。

文化持有者与文化研究者之间能否找到一种双向交流的方法,从而实现二者最佳的渗透交融状态呢?格尔茨早就深思过这个问题。格尔茨承认“去理解一些别人的贴近感知经验的概念,并将之有效地重铸进理论家们所谓已知的关于社会生活一般知解的遥距感知经验中去,是一种极其设身处地精微细致的任务”。^⑥

麻山地区山体崩塌和山石滚落等地质灾害发生的频率极高,让研究者疑惑不解的是,尽管有政策的鼓励与支持,当地苗族群众宁愿花费精力去清理滚落到耕地上的石头,也不愿意修建固定农田。后经深入了解得知,苗族人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某地山体崩塌后,少则十数年,多则上百年不会出现大面积的

① [墨西哥]弗吉尼亚·加西亚-奥克萨塔:《灾难的史学研究》,苏珊娜·M.霍夫曼、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主编:《灾难与文化》,彭文斌译,第40—57页。

② 李景保等:《论湖南省水旱灾害的地理规律性》,《自然灾害学报》2000年第4期。

③ [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④ [德]李凯尔特:《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76页;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⑤ 孙晶晶:《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马克斯·韦伯价值思想探析》,《理论界》2014年第7期。

⑥ [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第74页。

崩塌,这就意味着只要清理了一次滚石,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地方都是安全的。^①可见文化研究者与文化持有者的双向交流之重要性。

解读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体系的“意指结构”,其自身文化的本土化经验感受、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内部眼界”至关重要。在挖掘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的过程中,一方面积极鼓励本土研究者和当地人的参与。本土研究者对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有深入的了解,可以从自身的经验和视角出发,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为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谱系建构提供更准确、全面的资料和观点。另一方面,外来研究者也应该以“当地人的视角”^②探讨社会组织、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等因素对灾害应对能力和村寨恢复的影响,在分析灾害问题时应该考虑当地社会和文化背景,尊重当地人的经验和知识,与当地进行密切合作与交流,确保当地人的观点和需求得到充分考虑,促进相互理解和共识的形成,从中获取洞察力,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观点和态度,从而实现更全面、客观地理解和分析当地的灾害知识,实现文化持有者和文化研究者双向交流,为防灾减灾工作提供更有效的指导和支持。

三、外来启迪与本土发声: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谱系建构路径

从概念上来看,与“本土”对应的是“外来”或者“异地”。“本土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除了美国以外的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中掀起的带有普遍性的学术运动,意在倡导世界各国从本国的社会实际和社会需求出发,批判与吸收外来知识体系以充实本土知识库,从而切实解决本国的现实问题,揭示人类社会和人自身行为的客观真相。^③

(一) 外来启迪:本土化的“他山之石”

本土性知识也可被译为地方性知识,基于本土、源于本土,是一切知识进化的源头。地方性知识的首倡者是阐释人类学家格尔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殖民的深入促使全球人口大循环、现代科技的发展加速了全球信息大传播,导致全球各地文化与思想碰撞频繁,人们快速摒弃自身的特性,逐步迈向文明统一的“全球村”,不同文明形态不断被摧毁与破坏。而此时的西方在理论上显示出“贪大求全”的学术倾向,“整合”、宏观、全方位、共性、“规律”等成为当时的关键词。^④

以格尔茨为代表的少部分人开始反思与质疑全球化理念,争论与审视文明统一的合理性,并通过实践活动认识到西方文化之外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故开始强调“地方性知识”,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具有差异性,主张做具体细微的田野个案考察。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对殖民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地方性和全球性冲突的后现代后殖民契机引发了人文科学界对“地方性”的重视和重申。^⑤地方性与后现代意识共生,与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后殖民主义对西方霸权主义的批判联袂而行,既与民族志、田野作业研究方法密切相关,也与康德有关科学知识的先验构造和胡塞尔有关严密科学的构想的最终失败相呼应。此后,地方性知识在国外经历了理论研究阶段、实践知识挖掘阶段和不同文化融合阶段^⑥,即地方性知识的概念界定与理论体系建构^⑦、地方性实践知识的挖掘与提炼^⑧、探索地方性知识与现代科技的结合路径。^⑨

① 杨庭硕:《麻山地区频发性地质灾害的文化反思》。

② Geertz, C.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③ 周晓虹:《本土化和全球化: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双翼》,《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

④ [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第39—40页。

⑤ [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第20页。

⑥ 蒋培:《国内外地方性知识研究的比较与启示》,《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

⑦ Rouse, J. (1987). *Knowledge and power: 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⑧ Strang, V. (2004). *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World kind: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Relations to Land, Development and Local Knowledge*, Routledge Taylor&Francis Group.

⑨ Antweiler, C. (1998). Local Knowledge and Local Knowing. 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Contested “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Context of Development. *Anthropos*, 93(4/6), 469-494.

从中国知网的文献分析来看,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以地方性知识、地方性为主题的文献才在国内发表。2000年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此后,盛晓明、叶舒宪、任剑涛、杨庭硕、吴彤、罗康隆、罗意等学者对地方性知识展开了深入研究。地方性知识进入中国之初,经历了概念探讨、结构与情境梳理、叙事方式重构等过程。^①其中,地方性实践知识的挖掘与提炼的研究备受青睐,不少关于各民族地方性知识的研究成果被搬上学术舞台。如侗族先民为了适应以低山丘陵为主的生存环境,通过使河流改道的办法,在河滩密集地建构了稻田、池塘和灌溉网,以此多层次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山地丘陵则用于生产原木,并且在林地实行林粮兼作,有效抑制了水土流失。生活在喀斯特山区疏林灌草地带的苗族先民建构了一套能通过地表植物物种和植物的生长态势判断土层厚薄的技术,因此苗族先民能够将苗木快速培育成林。生活在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的彝族先民实行轮歇交替的方法,并在同一地段实施混合耕作、多畜种混群放牧,实现了高效产出与生态稳定。^②

然而,由于起步较晚,中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检验西方中层理论的阶段,自身的理论建构步履维艰。2008年汶川地震,血淋淋的生命代价给中国留下太多需要总结和反思的东西。中国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与审视本土灾害知识谱系建构的理论路径。西方的理论建构过程与方式、理论框架、历史脉络等成为学习与借鉴的对象。如何在西方文化霸权的强势交流下保持清醒的文化主体意识、如何在汲取西方营养的同时又不失本土文化自信成为当时至今学界重点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在理论本土化过程中,一方面,西方的“理论本位论”需要进行实现契合中国本土实际的“实践本位论”的转变。不同国家的社会现实具有差异性,某些理论适用于西方社会,但并不一定适合中国。因此,既要借鉴西方,但更重要的是跳出西方、超越西方,去创新适合本土的、地方性的、自身传统与背景的本土灾害知识研究模式,杜绝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撕裂中国文化现实。另一方面,要重视文化主体意识。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理论体系的建构、话语方式的表达、社会意义的建构都应该在其文化系统下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解读方式和言说方式的基础上来进行。将西方理论与本土社会情况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新理论,这是一个“学着说”到“接着说”的过程。

(二)“整理国故”:本土知识与经验的发掘与表达

千百年来西南少数民族为了适应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了许多独具特色的传统智慧,这些文化极具实践性、地域性,是防灾减灾的重要手段。因繁衍生息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不同群体与个体对灾害的社会建构和体验各有不同,基于当事人的经验和身份的影响,单一的灾害会碎裂成一系列不同的解释、符号、象征和意义,其背后隐藏着深厚的文化逻辑与社会意义,用其独特的方式解释着灾害的形成机制、演变路径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应对模式。这一系列世代相传的生存知识、技术实践、生存经验与智慧就是各民族的灾害知识,承载于神话传说、祭祀仪式、文学艺术、习俗庆典之中,形成少数民族群众的防灾避灾减灾思想,在应灾、抗灾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凉山彝族的地方性知识为例。在与大自然的不断适应过程中,凉山彝族形成了独特的灾害知识,体现在民间信仰、宗教仪式、人生礼仪、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如彝族群众认为灾害发生与得罪神灵有关,因此灾后常有反思自身行为并举行仪式以表补救。1997年四川省美姑县乐约乡发生特大滑坡,幸存者将这一灾难的罪魁祸首归咎于“当地人猎杀了一头野猪”,认为野猪是神灵的宠物,伤害野猪会得罪神灵,因此神灵降下灾难以惩罚人类。这反映了凉山彝族对于灾害发生的认知,体现了彝族群众天人和諧的自然伦理观。以尔比^③为代表的彝族口传文化富含地方性减灾知识,如“朝有淡积云,夕时有雷雨”,“鸡

① 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哲学研究》2000年第12期;叶舒宪:《“地方性知识”》,《读书》2001年第5期。

② 杨庭硕:《地方性知识的扭曲、缺失和复原——以中国西南地区的三个少数民族为例》,《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③ “尔比”是彝族群众中广为流传的一种民间文学形式。它一般以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的短语和格律诗的形式表达感情和哲理。有的专家学者为了翻译的需要,把“尔比”译成谚语、成语、谜语或格言、名言之类,还有译为歇后语、熟语等。

月狂风呼，牛月必雷雨。羊月雪压山，定是丰收年”^①，“鹰过天晴，雁过天阴”，“虹出东方要下雨，虹出西边要天晴”，“雷横着打，有雨也不大；雷竖着打，大雨倾盆下”等谚语，体现了彝族人生态气候变化的感知与利用，以及对于灾害的预测和准备。创世史诗与英雄神话反映了灾害对于彝族人生产生活的文化和文化的建构。如火把节起源于彝族先民用火把消灭蝗虫以保护庄稼。彝族先民居于山区，雷灾频发，英雄支格阿龙用铜收服雷神的神话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至今仍有彝族群众戴铜手镯以避灾。日常生活中的减灾举措承载着彝族人适应生境的诸多体验，并通过家支制度以及民间习惯法等得以维系和保障。如“彝族依山居，汉族傍水住”，“汉族靠森林居就亡，彝族临大河居就绝”，体现出不同民族生存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差异。又如 21 世纪初，面对极具现代性色彩的海洛因和艾滋病的侵害，彝族群众利用习惯法与仪式、家支组织、信仰与尊严、民俗道德、亲情教化等集合的文化力量战胜了人类生物性的成瘾性，以至于这种戒毒模式成为彝区乃至亚洲地区最成功的戒毒实践之一。^② 同样，在森林防火工作严峻时期，村干部会召集全村彝族群众集体盟誓，发誓不带火进山，不在野外使用火等，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彝族群众的用火行为。这些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事项，或经由彝人世世代代口口相传，或存在于历史久远的彝文古籍与毕摩文献中。因此，凉山彝族的灾害知识就是凉山彝族人民与自然共生的地方性知识系统。在这一知识系统中，蕴含着彝族群众的灾害观、风险观、生命观等核心概念和人与环境互依互存关系的实践累积，体现了人与自然万物平等的和谐并存思维、“人类犯错—天神惩罚—好心人得救—繁衍人类”的灾害认知模式。

从这些本土文化基因智库中提炼出优秀的本土灾害知识是建构本土灾害知识谱系的重中之重。至于如何提炼？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重视并开展西南民族地区灾害史研究。将历史上环境灾害，特别是生物灾害的产生、演变及其对地球生态体系的影响纳入对自然生态系统，尤其是人与自然共生系统所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的考察中，弄清其发生根源及作用机理，探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③

其次，开展西南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与经验的整合与研究。地方性知识来源于当地居民长期与灾害斗争过程中积累的智慧和经验，包括传统的灾害应对策略、文化习俗和社会组织形式等，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这些知识，以更好地理解本土灾害知识的特征。

再次，关注西南少数民族对灾害的文化表达和意义建构。通过收集和整理相关的口述历史、民间故事和传统知识，分析西南少数民族对灾害的文化表达形式，如艺术、文学、音乐、宗教仪式等，以及这些表达形式背后的意义和象征，进一步理解灾害对文化认同和社会凝聚力的影响。

最后，从本土经验现象建构理论与方法。这一步是在前三步的基础上实现的，是在前三步的搜集、分类、分析的基础上，高度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与方法。这一过程需要经过“观世”“寻名”“分类”“求序/绪”“定型”“成理”六个阶段。^④

（三）本土发声：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知识谱系国际话语权的构建

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既是一种已然的知识形态，又表现为一种生成的过程，具有开放的性质；既是世界知识谱系中的一部分，也将为世界灾害研究提供本土经验和地方性知识，为本土灾害知识共有的理论体系、概念图式、话语方式和发展提供合理性支撑。如果说“输入学理”、地方性知识的挖掘与实践是本土学术主体性构建的过程与实践，那么“输出学理”，将“地方性知识国际化”是中国建构国

① 凉山彝族纪月采用十二属相，分别以鼠月、牛月、虎月、兔月、龙月、蛇月、马月、羊月、猴月、鸡月、狗月、猪月纪一年十二个月。

② 庄孔韶、杨洪林、富晓星：《小凉山彝族“虎日”民间戒毒行动和人类学的应用实践》，《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

③ 周琼：《诱因与转型：西南边疆灾害孕育的环境变迁历程再审视——兼论生命共同体视角下的自然生命平等观》。

④ 赵超越：《“本土化热”背景下的社会学理论观：学理探讨、建构困境和方法图景》，《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4 期。

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

在西方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所建构的知识等级对本土生态知识形成的“文化贬抑”的形势下，无数传统文化处于失语地位，中国的理论建构与输出困难重重，但并非无计可施。中国的学者正在为建构理论与输出理论做出有效尝试，中国各民族丰富的本土生态知识更是为具体实践与理论构建提供有价值、启发的本土案例。

比如，锡林郭勒草原牧民在草原治理方面有优秀的本土智慧。他们结合春夏秋冬的气候条件与牲畜的生命周期来选择最适宜的生存空间，如春季营盘选择背风雪的地方、夏季营盘选择山岗和高台地、秋季选择有好草的戈壁和平滩、冬季在上南麓坡地上背风雪的山沟里或硬滩地。这种“以‘流动性’为核心的游牧本土生态知识是人类与环境‘不确定性’共存的一条重要的社会文化途径”^①。在制度与文化层面，有一套以牧民“自主决策、互惠合作为基础的富于弹性的社会组织方式和以‘神圣自然’观念为基础的自觉保护自然的环境伦理”，形成了“知识—实践—信仰”复合体的本土理论。^②

又如在石漠化灾变最严重的贵州省麻山地区，苗族采用复合种养生计，即在农田中有意识地保留一定数量的野生植物或半驯化的野生植物，并保留着高大的乔木和藤蔓类，将家禽放入农田里消灭害虫，收割后农田变成牧场。这样的生计模式，一方面因农作物和野生植物并存有效抑制了水土流失；另一方面，农田结构事实上是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的“人工缩版”，有利于生态恢复。显然，麻山苗族的复合种养生计模式既是当地生态系统对苗族文化模塑的产物，又是能成功规避灾变后生态脆弱环节的资源利用范式。^③

本土理论需要他国的检验，因此构建理论必须以全球化视角为前提，注重多元主体性，使得不同的主体性之间有可能获得某种共通性，抑或如胡塞尔所说的“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④，通过自身的独特方式去寻求实现人类的整体性时，“国际连带”才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可能。^⑤此外，输出本土理论是建构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学术地位、打破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重要手段，体现了一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影响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可从本土案例中提炼出灾害应对模式，从而构建属于本土的理论范式，并通过以下途径与其他国家分享：通过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如学术访问、学术讲座、学术研讨会等，向国际学术界介绍本土理论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吸引国际学者的关注，获得他们的认可；与国际学者共同开展研究项目，共同探讨本土理论在国际背景下的应用和发展，促进本土理论的国际化；培养一支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学术人才队伍，推动中国学术话语的建构和发展。

四、文化防灾实践：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谱系的运用

“文化防灾”是李永祥提出的概念，是指通过文化的方式来实现防灾减灾的目的，是本土灾害知识在防灾减灾中的应用。^⑥具体来说，文化防灾就是利用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经验中沉淀下来的具有防灾、抗灾、减灾功能的文化传统，从文化上减少灾害所造成的影响。^⑦文化防灾又分为“观念性文化防灾”和“实践性文化防灾”，前者指“以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为基础进行抗灾和减灾活动的方式”，如神话、仪式、宗教信仰等，对人类思想和行为方式具有指导作用。后者指能够用在社会实践中的具有地方性知识的方式，是直接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具有防灾减灾功能的行为，如灾害中的自救与互救、社会组织行

① 荀丽丽：《与“不确定性”共存：草原牧民的本土生态知识》，《学海》2011年第3期。

② 荀丽丽：《与“不确定性”共存：草原牧民的本土生态知识》。

③ 田红：《喀斯特石漠化灾变救治的文化思路探析——以苗族复合种养生计对环境的适应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④ 周晓虹：《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⑤ Hwa, Yol, Jung. (2002). *Comparative,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Oxford: Lexington Books, 2002:248.

⑥ 李永祥：《灾害文化与文化防灾的互动逻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⑦ 李永祥：《灾害文化与文化防灾的互动逻辑》。

为等。^①文化防灾作为非结构式防灾的重要部分，与结构式防灾互为补充而存在于西南少数民族社会中。

（一）防患于未然：灾前防灾文化的实践经验

“防患于未然，遏难于未发”的忧患意识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各民族历史文化中关于灾害预防的知识数不胜数，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重视农业、储粮备荒、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通过改良社会和自然条件以达到预防灾害的目的。《汉书·食货志》中晁错言：“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善积，以实仓廩，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②《齐民要术校释》记载“芋可以救饥馑，度凶年”，因此“蜀汉既繁芋，民以为资”，又说“凡此诸芋，皆可干腊，又可藏至夏食之”。^③农作物的种植模式与防灾减灾有着密切关系，如“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旱。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④在古代重农思想和农业技术的影响下，西南民族地区形成了多种农业种植模式，如哈尼族“稻鱼共生”的生态模式^⑤、“果—草—兔”生态农业模式^⑥、猪—沼—果（茶、菜、药）生态农业模式^⑦、农牧渔结合模式、庭院经济模式等，既保证了食物来源，又平衡了生态系统。

储粮备荒也被视为历代防灾的重要举措，如《说积贮疏》中载：“仓廩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果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⑧，又载“能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者，可御水旱之末。当患而为之备，既灾而为之捍者，可免流离之苦”。^⑨储备粮食以备荒的思想现仍存在于西南少数民族社会中。苗族的建筑以木质材料为主，容易发生火灾，因此苗族粮仓通常远离居住空间，建于门槛对面或自家田边。这样的储粮方式可以在火灾发生时保留粮食，且木质结构的储藏建筑具有防潮功能，能有效保护粮食。^⑩

兴修水利工程也是防灾的又一举措。《荀子·王制》也说：“修堤梁、通沟洫、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耕耘，司空之事也。”^⑪鄂尔泰曾说：“窃惟地方水利，为第一要务，攸系民生国计。”^⑫故历代兴修水利者众多。治水防灾的方式各式各样。受到古人的影响与启发，中国历朝均十分注重水利的建设以防灾，无数的水库建设就是最好的证明。此外，哈尼梯田水利设施建设^⑬也是利用地方性知识防灾减灾的手段。

植树造林有利于对水量的调节，对水灾预防具有重要作用。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森林的这一功能，如《管子传》记载“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穡，修墙屋。此谓厚其生”。^⑭居住在云南普洱一带的拉祜族认为山神是守护村寨的神灵，喜欢茂盛的森林，常栖居于密林之中，因此拉祜族人热爱森林，屋前屋后都会栽树，不会轻易砍伐树木。苗族则有立碑蓄林护山的习俗，因苗族人认为灾害的发生是当地民众不当的行为破坏了风水所致，故而立碑护林，确立严格的惩罚措施，从而保护了森林。此外，苗族还利用榕树耐水湿、根系发达等特点，在河堤两岸栽下榕树以保护河堤与防止水灾。^⑮

可见，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灾害预防中总结出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被重构，

① 李永祥：《灾害文化与文化防灾的互动逻辑》。

② （汉）班固：《汉书》24卷上《食货志》，（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1页。

③ （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校释》，缪启愉校释，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169，172页。

④ （唐）房玄龄：《晋书》卷14《地理志上·总叙》，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12页。

⑤ 郑伟林、李凯冬、卢保和：《哈尼梯田水利研究》，《红河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⑥ 彭燕、邓玉林：《果—草—兔生态农业模式的综合效益试验研究》，《四川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⑦ 杨维平：《西南地区生态农业模式类型与分析——以恩施自治州为例》，《北京农业》2007年第15期。

⑧ 刘永济校释：《文心雕龙校释》卷下《说积贮疏》，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53页。

⑨ （明）俞汝为：《荒政要览》卷2《奏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93—194页。

⑩ 谢仁典：《清代贵州苗疆灾害及苗民灾害文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21年。

⑪ （战国）荀况：《荀子简释》第9篇《王制》，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1页。

⑫ （清）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卷118《各省水利五·兴修滇省水利疏》，湖南：岳麓书社，2004年，第561页。

⑬ 郑伟林、李凯冬、卢保和：《哈尼梯田水利研究》，《红河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⑭ 梁启超：《管子传》第11章《管子之经济政策·奖励生产之政策》，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8页。

⑮ 谢仁典：《清代贵州苗疆灾害及苗民灾害文化研究》。

并结合社会其他因素反复应用、验证,既构成了灾害文化的整体性,又使得出于不同适应需要而做出的其他文化创新也获得了稳态延续的能力。

(二) 群体互助:灾时应灾文化实践

西南少数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中积累了应对灾害的方法,如赈济、调粟、养恤、除害等。官方救灾手段和民间应灾方式相结合,共同渡过难关。如文献载“文帝后元六年,夏大旱蝗,……发仓庾以赈民”。^①《元史》中记载了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二月,咸淳府(今重庆市忠县、临江、垫江、南宾、丰都、龙渠等地)发生灾害,官府“以钞千锭赈之”。大德十一年(1307)七月,江西、河南等多地发生饥荒,中央“遣官赈之”。^②文献中还记载了工赈,“二十五年,直属有司有应修河道沟渠等工,将上年截留北仓漕米所存十万石,作为修浚河渠以工代赈之用”。^③

除了官方赈灾,民间也有赈灾救济的做法。如东晋初,范广为堂邑令,“后大旱,米贵,广散私谷振饥人,至数千解,远近流寓归投之,户口十倍”。^④宋元嘉末,刘善明之父刘怀人任齐、北海二郡太守,“青州饥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积粟,躬食糲粥,开仓以救,乡里多获全济,百姓呼其家田为续命田”。^⑤《元史》载,“大德八年(1304),蜀人饥,亲劝分以赈之,所活甚众。有死无葬者,则以己钱买地使葬”。^⑥可见邻里互助、宗族互助以及富贵人家救济受难群体是当时社会应对灾害的一种民间机制。

此外,元代的社会基层机构“社”在灾害互助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元史》记载了“社”的基本制度:“社中有疾病凶丧之家,不能耕种者,众为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灾病多者两社助之。凡为长者,复其身,郡县官不得以社长兴科差事。农桑之术,以备旱暵为先。凡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以时濬治。或民力不足者,提举河渠官相其轻重,官为导之。”^⑦显然,在灾害面前,“社”成为群体互助的纽带,帮助受灾人群渡过难关。

古人的互助思想为后人提供了精神养分,西南少数民族应灾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互助思想无不受到历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云南新平曼糯村的傣族在抢救、帮助、收留受灾村民时,打破了傣族参与烧尸体者不能回别人家的禁忌。^⑧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人文关怀打破了文化禁忌,成为生命至上的文化回应。凉山彝族家支之间荣辱与共、同甘共苦,凡遇变故皆由家支共同应对。1997年凉山美姑县乐约乡遭受山体滑坡时,来自四面八方的家支亲戚构成抢救队伍的主力军,抢救、帮助、安抚、收留灾民。^⑨可见人们在面对共同灾难时,群体利益会超越个人利益,展现出团结和互助的力量。同时,这种共同经历和共同奋斗的经验可以加强村寨和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三) 劫后重生:灾后家园重建与文化适应

蠲缓、安置流民、借贷、鼓励早作、节用等方法古时最常用的灾后社会恢复方法。关于蠲缓和免税的记载如:“吴兴、义兴遭水县,蠲除租调。”^⑩咸康二年(336),“以旱诏太官减膳,免所旱郡县徭役”。^⑪王圻在《赈贷群议·第四议抚恤》中还说:“灾伤遇贤有司,多方济,缓赋宽逋,贷种葺庐,尚堪存活,不至流窜。万一他邑流移至我疆界,须念呻吟愁怨,上千天和,驱逼啸聚,类致揭竿。要必禁谕有术,招抚有方,寄食有备,贍葬有道,掷妻捐子,录育有宜。不愿复业,许令附籍,思返故乡,

① (朝鲜)禹汝楙:《洪范羽翼》卷40《曰僭·常暘若》,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52页。

② (明)宋濂:《元史》卷22《武宗本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85页。

③ (清)杨景仁编:《筹济编》卷13《兴工》,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197页。

④ (唐)房玄龄:《晋书》卷90《良吏·范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36页。

⑤ (唐)李延寿:《南史》卷49《刘善明》,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28页。

⑥ (明)宋濂《元史》卷120《察罕传附立智理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959页。

⑦ (明)宋濂:《元史》卷96《食货志一·农桑》,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355页。

⑧ 李永祥:《傣族社区和文化对泥石流灾害的回应——云南新平曼糯村的研究案例》,《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

⑨ 2022年8月24日在凉山州美姑县拉玛镇采访灾民HLMM所得资料。

⑩ (梁)萧子显:《南齐书》卷3《本纪第三·武帝》,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6页。

⑪ (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第143《帝王部(一百四十三)·殍灾》,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607页。

资给路费。此仁人君子，忠厚存心，亦弭盗睦邻之大义也。”^①可见灾后蠲缓和免税的做法一方面缓解了灾民的压力，给予灾民实质性的帮助，使其更快恢复社会生活。

关于安置流民和赈灾也有许多记载：梁武帝在天监十七年（518）提出：“凡天下之民……若流移之后，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亲属，即为诣县，占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恋本者还有所托。”^②“至大二年（1309）二月，武宗下诏：诸处流移人民，仰所在官司详加检视。流民所致之处，随给系官房舍，并劝谕土居之家、寺观、庙宇权与安存。其不能自存者，计口赈济。还乡者，量给行粮。据元抛事产、租赁钱物，官为知数，复业日给付。”^③“致治二年（1322）九月，临安河西县春夏不雨，种不入土，居民流散，命有司赈给，令复业。”^④东晋时期，孙坦“运家米以赈穷乏”，“百姓赖之”。^⑤范广“广散私谷振饥人，至数千斛”，“远近流寓归投之，户口十倍”。^⑥“大德八年（1304），蜀人饥，亲劝分以赈之，所活甚众。有死无葬者，则以己钱买地使葬”。^⑦

同时，历代官府还会借贷粮种、耕牛等给灾民，使其更快恢复正常生活。管子说：“民之无本者，贷之圃疆。”又说：“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⑧《宋书》也载：元嘉二十年（443），“诸州郡水旱伤稼。民大饥。遣使开仓赈恤，给赐粮种”。^⑨《南史》载南齐武帝即位初，戴僧静“出为北徐州刺史。买牛给贫人令耕种，甚得荒情”。^⑩

灾害发生后，官方和民间都会兴起节俭之风，认为人的奢靡无度得罪了神灵，需要通过节俭来赎罪。《习是编》载，宋庞籍提倡抑制奢靡以救济百姓：“窃思东南上供粮米，每岁六百万石，至府库物帛皆出于民。民于饥年艰食，如此国家若不节俭，生灵何以昭苏？……抑奢侈！以济艰难。”^⑪太元三年（378），又因年谷不登，“事从简约，九亲供给，众官廩俸，权可减半”。^⑫咸和九年（334）六月，成帝又下诏，“省刑，恤孤寡，贬费节用”^⑬还有禁酒的做法，如宋文帝元嘉十二年（435），六月，丹阳、淮南、吴兴、义兴大水，“是月，断酒”^⑭。虽然这种观点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不可否认这样的做法在灾荒时有着积极的作用。

现代的灾后重建中，“在领导和组织上，自上而下；在资金扶持上，实行对口支援；在重建效率上，要求高速完成”^⑮，这种高效的重建模式被称为“中国模式”。具体而言，中国灾后重建的模式可以体现在八个方面：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组织模式，科学规划、依法实施的保障模式，高度集中、充分授权的体制模式，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的普惠模式，救急为先、着眼发展的统筹模式，对口支援、团结协同的合作模式，相互融合、兼容并包的文化模式，传媒跟踪、相互联动的宣传模式。^⑯

然而，由于灾民无法快速从灾难中抽离出来，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容易出现灾民“缺位”与“失语”，导致灾民社会文化和人际网络的断裂，造成灾民心理上的“二次伤害”。因此灾后重建过程中应当尊重

①（清）杨景仁编：《筹济编》卷1《济荒总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117页。

②高敏：《南北史考索》上编《南史》卷6，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7页。

③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1051《元武宗三·又一款》，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72页。

④（明）宋濂：《元史》卷28《英宗本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24页。

⑤（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荒政部纪事一》，（清）蒋廷锡校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48页。

⑥（唐）房玄龄：《晋书》卷90《良吏·范晷》，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36页。

⑦（明）宋濂：《元史》卷120《察罕传附立智理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959页。

⑧（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荒政部总论一·管子揆度》，（清）蒋廷锡校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35页。

⑨（梁）沈约：《宋书》卷5《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页。

⑩（唐）李延寿：《南史》卷46《戴僧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50页。

⑪（清）陆曾禹：《钦定康济录》卷4上《事后之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861页。

⑫（唐）房玄龄：《晋书》卷9《孝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9页。

⑬（唐）房玄龄：《晋书》卷7《成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8页。

⑭（梁）沈约：《宋书》卷5《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2页。

⑮谭斯颖：《中国模式的灾后重建：精英化的景观改造实践——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16年第11期。

⑯张常珊、夏丹：《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国模式”探讨》，《首都建设报》2010年9月17日。

灾民的文化传统，加强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的沟通与协商，在广泛了解灾民意愿的情况下开展工作。

五、结 语

本土灾害知识影响着人们看待灾害的角度、应灾实践中的行为选择以及彼此间互动的方式，是人们认识和应对灾害的重要基础，也是考察和理解社会的重要维度。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谱系建构旨在挖掘、收集、研究和应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中关于灾害认知、预防和应对以及灾后重建的本土知识与文化，从历史与空间的维度了解把握本土灾害知识的诞生、成长、发展、进步与转化的过程脉络，这既是一个灾害历史谱系形成的过程，更是一个知识谱系建构的过程。

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谱系建构应从文化主位的视角出发，在尊重西南地区地理空间的“非均质性”和文化空间的多元性的同时，注重历史经验与启示，结合本土观点与“他者”视野。以外来启迪、整理国故与本土发声为建构路径，创造新的话语形态以阐释灾害知识谱系的现状和回应西方灾害研究的挑战，从而建构出自己的主体性话语结构。这就意味着应在充分认识本土灾害知识谱系的重要性、深刻把握本土灾害知识谱系的角色和定位的基础上，自觉对本土灾害知识进行挖掘、整理、抢救与保护，取精用宏，提炼出适合当下的本土灾害知识，并加以改造、创新后应用于防灾减灾中，与科技防灾互嵌而行，为灾害预防与应对提供切实可行的服务。

西南少数民族本土灾害知识谱系建构是一个“自我审视”与“自我描写”的过程，只有在充分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前提下，承认本土灾害文化的有效性，才能使本土灾害知识谱系的建构得以实现。因此，本土灾害知识谱系建构一方面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出发点，另一方面知识的挖掘、整理、提炼、创新、应用的过程会强化中华文化的文化自信，并为进一步实现文化复兴提供动力。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digenous Disaster Knowledge Genealogy of Southwest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China

LEWUAZHI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the high-frequency interaction of ideas and cultures promotes the continuous renewal and change of various civilizations. How to deal with the increasingly homogenizing trends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Disaster knowledge of Southwest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s an accumulation of practice in their interaction with nature,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regional and ethnic traits. It coexists with technologic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measures in daily disaster management systems. Based on the existing disaster research theories and methods, the genealogy of indigenous disaster knowledge of Southwest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China should be constructed with the overall logic of “cultural primacy — external inspiration—local expression”, the principle of “multiple coupling of geographical space and cultural space — multidimensional embedding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realistic needs”— “multi-directi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other”, and the path of “external inspiration — systematizing national heritage — local expression”.

Keywords: Southwest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digenous Disaster Knowledge, Genealogy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赵蔚平、陈慧妮]